

英武满华堂

——毛泽东和他的将军们

徐富俊 等编著



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

主编 刘少奇

長征詩一首
紅軍不怕
遠征難
萬水千山
只等閒
五嶺逶迤
烏

《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之二

英武满华堂

——毛泽东与他的将军们

徐富俊等 编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9 号

责任编辑:车 彦

封面设计:赵迎曦

本书编著者:

徐富俊 阮守应 韦祖松 高爱红 程光明 凌传茂 李雷

英武满华堂

——毛泽东与他的将军们

徐富俊等 编著

※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49.7 千字

印数:1—30000 册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76—393—5/Z·042

定价:5.10 元

我心中的话

(代序)

1937年我年仅4岁时就来到了主席身边。虽然时光已流逝55年,但当时在主席身旁呀呀学语、依依膝下的情景至今仍朦胧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从此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他老人家对我那颗慈父的爱心。几十年里,尽管历经坎坷,然而我始终对生活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记得10岁时,在新疆我和母亲一起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在党的大力营救下,4年后我的一家与同狱的其他同志们才得以重返延安。是老区的小米、党的关怀及主席的教诲使我长大成人,又与岸英从相识,到成婚。“贫穷”的主席把自己唯一拿得出手的一件大衣赠与我们以表达自己的心意;两秉水酒请来朱总司令、周恩来、刘少奇等革命前辈,向我九死一生的母亲和我们一双新人祝贺。岂料朝鲜战起,岸英牺牲。主席痛失爱子,我也成了20岁的未亡人。其后多年与主席相处,无论承欢膝下,或书信往来,老人一直视我为己出,唤我为“娃”、“亲爱的大女儿”,信后总是亲切地落款:“爸爸”、“父亲”。

记得1959年的一个夏日,爸爸在他的卧室与我谈人生时,说道:“七十三、八十四”,当时我还不知此典出于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不禁一怔。爸爸笑着说:“阎王不叫自己去。死亡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猛然意识到最关心我的爸爸最终会撒手宸宸离我而去,不禁凄然泪下。

在爸爸的关怀下,我读书、留学,以后老人家亲自操心,督促我

又成了家。文革期间我和丈夫双双下狱，罪名是：“反对江青的现行反革命。”爸爸得知后气愤地写下：“娃娃们无罪”，我夫妻才得以重见天日。

老人家当年曾对我说：“我死之后，你要是想念我，就到我的坟上来看看。”十几年来，我多少次徘徊在天安门广场上，望着巍峨的纪念堂，心潮澎湃，感到我的心还在与爸爸对话。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普通劳动妇女，尝尽了人生的苦辣酸甜。如今，我已鬓发花白，但回首一生，聊可告慰爸爸的是，我觉得自己活得还算真实。因为我记住了当年洒泪而别时，爸爸曾抚肩慰我：“你永远是我的大女儿。”

如今爸爸已经走了整整16年了。在这百年诞辰之际，承蒙中国人事出版社、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广东以及我家乡山东的朋友们，特别是曾在老人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一起著文，通力合作编写出版了这套《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作为纪念。

刘恩齐

写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

1992年8月30日

目 录

我心中的话(代序)	刘思齐
毛泽东与王震上将	(1)
毛泽东与叶飞上将	(24)
毛泽东与刘亚楼上将	(43)
毛泽东与许世友上将	(59)
毛泽东与杨成武上将	(75)
毛泽东与杨得志上将	(96)
毛泽东与肖华上将	(109)
毛泽东与张宗逊上将	(122)
毛泽东与陈伯钧上将	(139)
毛泽东与皮定均中将	(153)
毛泽东与陶勇中将	(163)
毛泽东与傅连璋中将	(170)

毛泽东与王震上将

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马跑桥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一、赴苏留学,毛泽东不忍放行 推心置腹,毛与王交谊非浅

1931年,王震任湘东独立一师政治部主任、政委时,组织上曾准备派他去苏联学习。但毛泽东认为王震性格豪爽,英勇善战,正是反围剿斗争所需要的人才,因此,不忍放行。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王震者,湘赣人也。”于是,王震便没去苏联,而是留了下来,参加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王震任红八军代政委,留守井冈山。

王震将军生性耿直,有时容易发脾气。一次开会时,毛泽东特地把他叫了去,说:“听说你脾气不好。”王震笑了笑,点点头,算是承认了,正等着挨批评。可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和毛泽覃大吵了一场。当他说要以兄长的身份批评毛泽覃时,毛泽覃更是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对他吼道:“这里是革命的地方,不是你毛家的祠堂!”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下来。

王震忍不住地问道：“后来呢？”“我还是忍住了。”毛泽东说：“就是对自己的弟弟也不能发火。”王震深受启发。

第三次反围剿后，由于左倾路线的排挤，毛泽东离开了领导岗位。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为首的军事领导集团，就开始推行一套与毛泽东的游击战完全不同的作战方法。

一次，王震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军事会议后，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跑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见到他很高兴，连忙叫他坐下。随后，王震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没有直接表态，而是问他：“你知道诸葛亮、关云长、张飞吗？”王震回答说：“略知一点。”接下来，毛泽东详细地讲了这几个三国英雄人物的故事。最后，他告诉王震：“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不能死打硬拼，更不能打阵地战，要注重打运动战，伏击战，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王震回到湘赣苏区后，虽然也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但在实际的对敌斗争中却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来做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震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副旅长、政委、旅长兼政委，率部奔赴抗日前线。1939年10月，奉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命令率部返回延安，兼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和延安卫戍区司令员，担负着保卫毛泽东、保卫党中央的重任。至此，毛、王交往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二、风云突变，毛泽东令王震回师陕甘宁 打破封锁，王将军率所部进军南泥湾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大举进犯波兰，英法等西欧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被迫向德国宣战。这时，美英两国为了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联合起来向他们进攻，更加希望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求得与日本的暂时妥协。于是，他们便加紧策划“远

东慕尼黑”阴谋。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活动。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蒋介石虽然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他反共的立场并没有改变，认为“日本仅为中国身上之跳蚤，而共产党则为心上之毒疮”，“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实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并于会后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制造了一连串的反共摩擦事件。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小规模军事摩擦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从1939年冬到1940年春，终于形成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地区之一。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向边区进犯，先后占领八路军驻防的枸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48个乡。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也组织绥德、清涧、吴堡三县保安队，攻打八路军，扰乱陕甘宁边区。胡宗南等还进一步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延安。

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大局为重，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领导边区军民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

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都已开赴抗日战场，边区留守部队兵力单薄，难以应付。鉴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急电华北敌后的王震，火速率部回师陕甘宁边区。王震接电后，率三五九旅昼夜兼程，赶赴延安，协同肖劲光、谭政领导的边区留守部队，给予进犯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的还击。首先，平息了何绍南叛乱，统一绥德警备区。何绍南自从到绥德后，强编保甲，抢劫民财，残害人民，无恶不作。他

诬蔑回师边区的三五九旅为“溃军”，限制群众卖给八路军粮食，不准群众借房给他们住。他还采用暗杀、策动暴动等手段，企图迫使八路军撤出绥德，以割断中共中央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王震决定拔掉这颗钉子，命令三五九旅指战员深入城乡发动群众，公开揭露何的罪行，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绥德群众纷纷要求边区政府对何绍南依法予以严惩。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电请国民党中央将何绍南撤职，并任命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为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不甘失败，率保安队包围、袭击八路军，结果被彻底打垮。其次，八路军在陇东还剿灭了受国民党顽固派指挥的赵老五匪帮。从此，绥德区的反共据点被拔除，绥德专区五县的国民党反共官员被赶走，恢复、建立了人民政权，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联成一片，陕甘宁边区的反共高潮被彻底粉碎了。

为克服日、伪军的围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经济封锁，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于1939年发动解放区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1940年底，毛泽东、朱德命王震率部开赴延安东南的黄龙山南泥湾地区，在随时保持战斗准备的情况下，以南泥湾为中心屯田开荒，发展生产。

1941年初春，黄龙山还未脱去洁白的素装。清晨，那喷薄而出的朝阳，透过薄薄的云层，照射着座座黑白相间的山梁，给天际增添了万道玫瑰色的光彩。

这时，八路军三五九旅的官兵在王震旅长兼政委的率领下，迈着矫健的步伐，浩浩荡荡地向南泥湾开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军队大生产热潮。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约百余里，其中心地区由三条河川构成，荒无人烟，杂草丛生，野兽成群，给部队的生活、生产带来了很大困难。三五九旅在开进南泥湾前后，通过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全旅官兵提高了对屯田垦荒、发展生产的意义

的认识,战胜了生产工具、饮食生活方面的重重困难,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迅速掀起了生产热潮。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展开,王震加强了对生产的管理,组织了各级“生产委员会”,并设专职干部负责生产工作。全旅统一安排训练和生产时间,坚持8个月练兵,3个月生产,1个月机动;农忙时集中生产劳动,农闲时集中练兵,生产、训练统筹兼顾。

在屯田垦荒工作中,全旅各级干部均以身作则,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旅长兼政委王震由于吃苦在前,成绩卓著,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劳动英雄,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表彰。

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41年,开荒11200亩,收获细粮1200石,粮食、经费自给率分别达到78.5%和76%。1942年,耕种面积达26800亩,收获细粮3050石,粮食、经费自给率分别达到88%和90.2%。1943年,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收获细粮12000石,蔬菜590万斤,洋芋、南瓜等折合粮食3000石,完全实现了粮食自给。全旅养猪6427头、牛820头、羊10602头,实现了王震提出的“二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生产指标。经费自给率达93.2%。

王震率领三五九旅经过二年多的奋战,终于将一个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为“粮食堆满仓,稻谷翻金浪,猪牛羊肥壮,鱼鸭满池塘”的“陕北江南”。三五九旅南泥湾垦荒的创举和经验,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起了典型示范作用。

毛泽东对南泥湾垦荒非常重视,他除了与王震保持经常的联系外,在百忙之中还抽空亲自去南泥湾考察。

1943年的秋天,是南泥湾的一个金色的季节。那金黄的糜谷、火红的高粱、沉甸甸的稻谷和多样杂色庄稼,在阳光的照耀下,随风起伏,呈现着一派丰收的景象。山头上红艳艳的枫叶,像漫天的火把在燃烧;成群的牛羊,像朵朵浮云在山腰游荡;鲜艳的野菊花,

黄一片、紫一片，把南泥湾的山山水水装扮得更加秀丽多姿，妩媚动人。

一个晴朗的中午，一阵隆隆的马达声，震撼了静谧的南泥湾。霎时间，南泥湾欢腾起来了：“毛主席来啦！”人们欢呼着，奔走相告，从路上，从田间，从场院上，一齐朝大路上涌去。毛泽东身着延安土布灰制服，神采奕奕，微笑着向人们走来，亲切地和大家握手。他紧紧握着王震的手，称赞道：“庄稼长得满好啊！”王震激动地说：“谢谢主席，这是大家的功劳！”随行的同志告诉王震，毛泽东来得很早，一进到南泥湾，看到苍翠的群山和长势喜人的庄稼，心里十分高兴，一边走一边看，连连称赞王震有办法，他还和地里劳动的干部战士亲切交谈，整整走了一个上午。

王震想：毛主席经过半天坐车的颠簸和步行，一定很累了，于是请毛泽东到旅部房子里洗一洗，休息一会先吃饭。毛泽东听了，风趣地笑着说：“刚来就开饭，可见你们粮食很多啰！”但他并没有进屋休息，而是要王震陪他去看新盖的房子和新开的窑洞。

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的人使出了自己全身的解数，有的烧，有的炒，有的煎，有的炖，做成了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整整摆满了一大桌。毛泽东看了看，笑着说：“这么多菜，我尝都尝不过来。”

毛泽东边吃边谈，关切地问王震：“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平均五钱油，菜随便吃。”王震旅长回答说。“星期天要改善生活吗？”毛泽东又问。“午饭，多半是吃大米、白面。”王恩茂副政委回答，“有时杀头猪，有时宰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

王震一边陪毛泽东吃饭，一边介绍部队的生产情况。他告诉毛泽东：“刚来的那年，平均每人种三亩地，一般只吃两餐杂合饭，就是用南瓜、洋芋、野菜拌合小米或玉米面做成的饭。1942年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每人每天可吃到斤半粮、斤半菜，每月二到三斤肉。今年平均种地十亩多，口号是不要政府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米，做到粮食经费全自给。明年的口号是‘耕二

余一’，每人生产指标是六石一斗细粮，不仅自己要够吃，还要给政府上交公粮。”

毛泽东听着，不时地点头微笑，他对王震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像国民党，他们连棉衣都要靠外国人。”

饭后，谈了一阵话。毛泽东叫王震陪他去金盆湾附近视察。

当王震陪着毛泽东走到一个放展品的房子里时，毛泽东看着那近两尺长的谷穗，结了四个棒子的玉米株，小磨盘似的大南瓜，非常高兴，尤其是看到一个碗口一般大，重达2.5斤的洋芋时，幽默地说：“嗨！这洋芋蛋真顽固啊！”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这天，毛泽东还参观了战士的宿舍、养猪场等地方。王震曾多次劝毛泽东回去休息。但毛泽东毫无倦意，兴致勃勃，一直到天黑才回到住处。

毛泽东在南泥湾的几天中，白天，由王震等人陪同，察看庄稼，巡视部队，和战士、老乡交谈，接见劳动英雄。晚上，住在阳湾的一个窑洞里，和王震等一起研究工作，作出指示。王震等离开后，他还要在灯光下看报、批阅文件和各地拍来的电报，指挥抗日战争，一直要到深夜才能休息。

1943年11月底，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和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开幕。毛泽东亲自参观了展览会并接见了王震。他高度地评价和总结了军队的生产，指出：“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创举，对于我们的民族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能够扩大

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伟大吗？”

三、将帅不和，主席托人调解 王震设宴，陈谭握手言欢

事情还得从1937年10月说起。一天，陈毅接到国民党省主席熊式辉的电报，称湘赣边谭余保游击队拒不下山改编，依然在打土豪，和国民党军队的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陈毅接电后，与毛泽覃烈士的妻子贺怡火速赶赴吉安，和第三战区行政公署会商南昌谈判达成的“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决议的执行问题。10月16日，陈毅决定亲自去湘赣边找红军游击队，动员他们下山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几经周折，陈终于到达了湘赣临时省委驻地甘家山。当天晚上，他就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吊在竹棚子一边，而竹棚子的另一边，以谭余保为首的湘赣临时省委正在研究如何处理他。

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陈毅被带出竹棚。竹棚前面坐满了人，有100多。主席台上坐着三个人，一律身背驳壳枪，头戴红军帽。坐在当中的一位还戴着墨镜，手里拿着根竹根做的长烟管。大家表情严肃，气势森严，就像要公开审问犯人一样。

“果然是他！”陈毅一被带到主席台前，戴墨镜者就对左右两边的人说。

“既然认识我，那就快松绑吧！”陈毅对主席台上的三个人正色说。

“哼，当了叛徒还不知耻！”

“不准你们随便叫人叛徒！”陈毅生气地说，“你们哪位是谭余保同志？”

“谁是你的同志？”谭余保摘下墨镜，“快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党中央分局代表，到这里来传达中央决定的。”陈毅回答说。

“就凭这张介绍信？”谭余保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由陈毅带去的，上面有项英签具的纸条说，“骗三岁娃娃去吧！你代表哪个党？哪个中央？我看是国民党吧！哈哈……”

“你不相信介绍信，我陈毅这个人你总该认识吧？”陈毅问谭余保。

“认识，在井冈山时就认识你陈毅。”“那时你讲革命头头是道，可现在你变成了叛徒。你要不老老实实交待清楚你叛党投敌的经过，坦白你这次上山的意图，我就杀你的头！”

任凭陈毅如何解释，谭余保就是不信。当陈毅讲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用“抗日救国”的口号代替“苏维埃救国”的口号时，谭余保更是怒不可遏，他走到陈毅面前，吼道：“我们历来讲阶级斗争，你却讲阶级合作。我们历来讲苏维埃救中国，你却要取消苏维埃。我们是人民的红军，你却要把红军拿给蒋介石改编为白匪，你这个可恶的叛徒！”

谭余保脸色发白，眼睛里射出两道寒光。这是异常危险的征兆。陈毅临危不惧，继续阐述党的主张。

“娘个屁，你们知识分子就是道理多！”谭余保说着，举起烟袋向陈毅打去。陈毅头一偏，烟袋打到肩膀上。陈毅向他抗议并郑重声明：“我讲的这政策，是党中央的决定，不是个人的意见，你可以派人下山问一问。你有意见，可以向中央讲。现在朱总司令他们到南京去了，叶剑英在武汉。”

“朱德也好，叶剑英也好，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来，也不会叫我下山跟国民党合作，不然我也要把他们抓起来！”谭余保情绪相当激动。

“你混蛋！”陈毅被激怒了，“我忍耐了好几天，以为你是共产党员、是红军干部。我现在才知道，你才是叛徒哩！斯大林、毛泽东你

也要抓起来，你根本不是啥子共产党员，不是啥子游击队长、你是个山大王，是土匪！”陈毅越说越激动，“谭余保，你要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要是土匪，就枪毙我吧！怕死不当共产党！”

此后，谭余保和陈毅又谈了几次话，逐渐觉得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最后，还是派人下山，查明了情况。

五天后，谭余保亲自给陈毅松了绑，并向他道歉。

陈毅坦然地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我脾气不好，请你不要见怪。”

误会终于消除了。

1943年，陈毅、谭余保二人都到了延安。一个还记得烟袋敲脑壳的事，在学习会上一提起这事，就强调农民党员要读马列主义；一个本来就没有忘记“土匪”的称号，又听对方旧事重提，更不高兴。从此，两人闹起了矛盾，见面连招呼也不打一声。此事让毛泽东知道了。

一天，毛泽东找到王震，笑着对他说：“王胡子，请你办件事。”

“什么事？主席。”王震问道。

“陈毅和谭余保闹矛盾的事你知道吧！”

“好像听说过。”王震答道。

“你同他们两人都是好朋友，你还是陈毅的‘崇拜者’，你请他们吃个饭，讲个和嘛！”

王震愉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王震扛上猎枪就出去了。这次，他打了两只大野鸡、一只小野猫。回来后，自己动手，做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两人到后，王震解下围裙，一本正经地说：“今天，我请你们来尝尝我做菜的手艺，陈军长，你就不要把桌子推倒了！”这句话出自刚强耿直的王震之口，更显得格外诚挚豪爽。陈毅、谭余保相互看了一眼，都放声大笑起来。酒席之间，三人谈笑风生。从此，陈、谭二人

握手言欢，成为至友。

四、率部南征，毛泽东谆谆教导 撤离延安，王胡子御敌断后

1944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将正在南泥湾主持屯垦练兵的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和延安卫戍区司令员王震召到了他的住处，并交给了他一项任务。要他派一个团长带领一个加强营，护送干部团经鄂豫边新四军五师根据地，到广东抗日游击区，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王震回到驻地后，找来了几个团长，一商量，都感到这次护送干部要经过日伪顽占领区，长途行军，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于是，王震又向毛泽东请示：由他自己亲自带领队伍护送。毛泽东笑着对他说：“你去嘛，我就另有打算，党中央研究一下，再谈。”

一天后：毛泽东又要王震去他那里。王震还未进屋，毛泽东就迎了上来，握着王震的手说：“你来了，很好！”进了窑洞，毛泽东又亲切地招呼王震坐下，谈话便开始了。

毛泽东首先询问了部队的情况，王震报告说。“今年我部开荒种地35万亩，可以达到‘耕二余一’，争取上交公粮一万石。最近，贺龙、林伯渠、徐向前、肖劲光同志，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聂荣臻同志，都先后去视察部队，并作了指示。叶剑英同志还亲自指挥团对抗演习。根据中央指示，我们一边生产，一边整训，政治工作和军事练兵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士气高昂，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听了，兴致勃勃地说：“你们是兵强马壮嘛！要告诉同志们，仗是有得打的，还有艰巨任务。今天找你来，就是谈这个问题。”

毛泽东从国内外形势说起，阐述了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他说，当前不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对我国革命空前有利。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和中国的敌后战场都取得了胜利，德日法西